

地方政府投资狂潮三问

■ 孟书强

来自各方面的迹象显示,地方政府主导的新一轮投资潮正在来临。据《华夏时报》日前报道,今年7月以来,广东、宁波、南京、长沙、贵州、重庆、天津等地方政府纷纷抛出促进投资和增长的计划。据初步统计,在过去的50天里,已公布的地方投资计划的总投资需求大概在7万亿元左右。

上一次4万亿刺激之后,地方政府债务累累,今年各地财政增速乏力,银行放贷日益谨慎,民间投资意愿较低,又恰逢地方政府还债的次高峰年。此外,4万亿的刺激计划以及此前多年地方投资导致的产能过剩问题尚未根本解决。在这样的时机选择再次推出7万亿乃至更多的投资计划,我们不禁要追问:钱从哪里来,钱向何处去,如此大规模的投资如何“保量”又“保质”,地方政府能否成为稳增长和调结构的主力军?

钱从哪里来?

先来看一个数字。截至2010年底,全国省、市、县三级地方政府性债务余额共计107174.91亿元,占全国GDP和地方政府综合财力的比重分别为26.93%和70.45%。从偿债年度看,这两年地方政府还将迎来还债的高峰。据社科院发布的金融蓝皮书测算,2012年,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偿债率将超过20%警戒线,达到26.6%,一直到2014年才能回到警戒线。地方政府偿债率是指地方融资平台贷款偿还本息金额与当年地方政府可用收入之比。该项指标数值越大,说明偿债能力越弱。

再来看一个事实。财政部7月13日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上半年全国财政收入63795亿元,同比增长12.2%,增幅同比回落19个百分点。此外,有媒体甚至测算发现,全国有近四成的省市级地方政府在时间过半的情况下,并未完成一半的财政收入任务,“时间过半、任务过半”这个在1994年以来的财政历史上的铁律首次被打破。

另一个严峻的事实是,随着国家楼市调控政策的日益严厉,地方政府以往依赖的土地财政已经难以维系,今年前7个月全国各地土地出让面积同比下降近1/4,卖土地获得的收入越来越少,这种情况下,赖以投资的大部分资金只能靠银行借贷和发债来解决。但日益商业化和市场化的银行显然不愿意再平白无故地充当“冤大头”。现在银行也要视项目的情况发放贷款,基础设施回款能力弱,许多银行或者怕坏账或者感觉效益比较低,都不肯再贷款。

即便是排除以上种种严峻的情形,地方政府恐怕也很难拿出这么多钱来。我们以长沙和贵州为例来测算一下地方政府的支付能力。根据统计



王利博制图

局的数据,长沙市去年全年的地方财政总收入只有668.11亿元,这意味着,8000多亿元的投资项目需要该市10多年的财政收入。而贵州省去年全年的财政总收入1330亿元,地方财政收入也不过700亿元,这将如何支撑上万亿的投资?

7万亿乃至更多的投资,钱从哪里来?这是我们首先要考虑的问题。

钱向何处去?

即使地方政府真的有这7万亿,我们也必须考虑另外一个问题,那就是钱向何处去?说穿了,就是这笔钱怎么花,花在什么地方。

统计显示,上一次的4万亿经济刺激计划已经造成了20多个行业的产能过剩,钢铁、水泥、多晶硅等行业尤为严重。目前低迷的世界经济形势,增速减缓的国内经济都在某种程度上意味着这些过剩产能难以在短期内被消耗。此外,与上一轮中央主导的“4万亿”投资计划具有统筹安排、系统协调等优势相比,此次地方版的7万亿投资计划各自为政,不可避免地存在重复建设、产能过剩等隐患。作为重复建设的重灾区,钢铁行业今年上半年利润同比锐减56.5%,最近中钢协副会长王晓乔透露的一吨钢只赚1.68元的现实更像是提醒我们。7万亿,是否会加剧和恶化已经存在的产能过剩的局面,我们不能不警惕。

以近期讨论最为热烈的汽车行业产能过剩问题为例。毕马威最新发布

报告》显示,2011年中国汽车闲置产能高达600万辆,相当于德国汽车市场规模的两倍,预计到2016年,闲置产能将上升至900万辆。虽然汽车产能过剩的风险日益加剧,但我们依然不断看到各大汽车厂商仍在扩大产能。今年上半年,新增加的产能就超过200万辆,但销量同比增长仅为几十万辆。

究其原因,无非是各地政府受到政绩观和GDP主义的影响。汽车行业对地方GDP的拉动规模相当大,也一度成为地方政府大力扶持的对象。中国汽车产业的主要税收集中在生产端,汽车产地在哪里,该地方政府就能获取巨大的财政收入,这样的税制安排无形之中推动了地方政府大干快上汽车项目。

如何以投资消耗掉目前过剩的产能,而同时又不因不当投资造成新的产能过剩,在稳增长和产能过剩之间寻求平衡,考验着地方政府的智慧和能力。走出投资刺激、产能过剩、紧急调整、经济减速、投资刺激的怪圈,把钱真正花到该花的地方,既保量也要保质,稳增长更要调结构,这是我们在决定钱花在什么地方时必须要考虑的。

钱怎么花?

我们欣喜地看到,在各地政府公布的规划中,地方政府投资越来越呈现出一种趋于务实的姿态。产能过剩、企业盈利较差的光伏等行业已经不再列入规划,旅游文化产业、海洋经济等新兴产业得到重视。

但是,我们也不要忘记,当年的光伏产业也正是在各地政府的大力推动下才如雨后春笋般兴起的,地方政府一窝蜂式的投资很难保证未来若干年在所谓的“新兴产业”上不重蹈光伏行业的覆辙。各地在出台产业规划,决定投资方向时,是否应该增强“全国一盘棋”乃至“全球一盘棋”的意识,在做出决策前,多看看,多比较,先看看别人都在忙什么,进而找出自己的优势所在,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而不是为了稳增长而稳增长,盲目跟风,从而进一步增加决策的科学性和前瞻性。

短期投资如果不能避免,我们就要关注投资效益的问题了。当前我们需要关注的不仅是经济总量问题,更是经济增长的质量问题。2009年的4万亿投资计划中,中西部固定资产投资投资资金来自国家预算内资金增长率分别为60.2%、89.2%,分别比东部高13.8和42.8个百分点。但正是由于这种行政性资金划拨,其投资效益大大低于东部地区。吃一堑长一智,这一次,我们如何确保投资的效益,当政府不能不考虑。

各地的计划不仅制定了重点发展的产业或产业集群,而且制定了具体的产值目标,单从这点看,就带有较浓的计划经济推动GDP的色彩。政府的强有力支持固然可以较快地吸引民间资金的参与,降低其早期的风险,但政府介入也鼓励了民间资金不顾市场规律大肆冒险扩张。如何在若干年后收回政府的巨额收入,地方政府不能不做打算。

地方政府帮富士康招工是偏私之举

■ 李宁

时值八月末,立秋还未走进,本当是秋老虎来袭,酷暑依旧之时,而在我国中西部地区,诸多中小微企业却已面临霜重露浓、寒气逼人的天气,身着薄衣,在冷风中瑟瑟发抖,形影相吊,好不凄凉。

说中小微企业形影相吊,是因为地方政府的过分偏私。

近日,富士康宣称在未来5年内将投资千亿在山西建设八大生产基地。据了解,为了能够顺利投产,山西晋城市除专门制定如减免税费等相关政策予以支持之外,还为富士康解决用工问题,三次以政府名义下发文件,要求各区县责任人全力配合招工,还专门以市政府的名义成立人力招募工作组,在全省各地甚至跨省招募大量工人。笔者手头还有一份《济源市2012年协助富士康济源项目招募员工工作方案》,内容相近。甚至连市公安局、民政局、司法局、审计局、统计局、旅游局都有招募指标。

俗话说,手心手背都是肉。为何地方政府对富士康宠爱有加,而诸多中小微企业正艰难度日,却不见政府施以援手?如此厚此薄彼,怎能不令其他企业身心俱寒。

“GDP至上”导致行政权力和资本快速结盟

晋阳、济源并非个案。近年来,地方政府滥用公共资源为富士康鞍前马后,使其享受超国民待遇,早已是见怪不怪。四川省各市、县、村都接到了任

务,党员干部和政府公务员顶在招工第一线,为完成任务费尽心力。更匪夷所思的是,招工成绩还被列为年终考核的项目之一。据称达标者会得到奖金,未达标者将处以罚款。据说,除了垂直下行、各地市摊派,一些如“买人头”式的灰色市场行为也已浮现出来,尽管颇受争议,但富士康在河南、广西、重庆、四川、山西等设立新厂之际,所到之处还是被地方政府奉为高高在上“财神”。原因为何?自然是GDP的诱惑。

富士康2011年的出口额居中国首位,达1117亿美元,雇佣人数也多达120万人。以晋城为例,如果当地为富士康量身定做的金匠园区全部投产,仅富士康就可以为晋城增加600亿元的GDP。而2011年晋城市生产总值是895亿元。富士康这样的巨无霸企业可以为地方政府带来巨额投资、GDP增长和就业规模,而在GDP至上的发展模式下,地方政府目前这种“亲资本”的政策导向也就顺理成章。这或许是晋城政府不辞辛苦为富士康万里跨省招工的动力所在。

滥用公共资源厚此薄彼有碍市场公平

发展地方经济、增加GDP原本无可厚非,但是政府帮助企业应有边界,非常规的、甚至违法违规的手段,恐怕只会适得其反。对以富士康为代表的特大型企业笑脸相迎,对其他中小微企业则是冷眼相对,地方政府此举,显然是有违市场经济规律的不公之举。富士康的内迁本无可指摘,然而

地方政府为争取富士康到本地落户,不惜滥用公共资源,在税收、土地征用、厂房建设等方面对富士康慷慨补贴,甚至把为富士康解决劳动力供应问题作为“政治任务”。市场经济本应是开放的、自由的,地方政府行政权力与资本结盟的这种强势介入与干预,无疑是对市场秩序的一种戕害。

而在金融危机的阴影还没消散之际,一些中小微企业生存状况举步维艰,却在政府门前屡屡碰壁,求告无门。市场经济的内在规律倡导公平竞争,为了一家企业,地方政府动用庞大的资源,把大量人力物力投入其中,这显然有违市场公平。政府对于所有企业,应当一碗水端平,不应厚此薄彼,在劳动力供应紧张之下,动用公权力帮一家企业争夺劳动力资源,那势必对其他企业不利,那些企业岂能服气——同样向政府纳税,为何我们要低人一等?如果其他一些企业也开始要求政府提供“富士康式”的招工服务,当地政府又该如何是好?

压榨人口红利加剧企业成本与转型压力

在全球经济持续低迷、人口红利消失拐点即将来临的大环境下,地方政府的偏私行为,对其他企业的生存来说,无疑是雪上加霜。

数据证明,我国“人口红利”临近消失转折点。2011年我国15—64岁劳动年龄人口的比重自2002年以来首次出现下降,为74.4%。有专家推算,人口红利的转折点将在2015年来。近年来,沿海地区出现“民工荒”,

并迅速向内地蔓延,各地近年都陆续出现“招工难”的情况。富士康落户中西部,有摆脱过度集中于华南的企业危机的考量,但基本原因还是在于中西部“人口红利”,以此转嫁工厂运营成本。据了解,单单晋城富士康工厂就需要6万名工人,而政府为解决这一招工难题,甚至规定每介绍一个人去富士康上班,就能领到300元补贴。随着用工人数的逐步增大,还涨至500元。政府以公权力为富士康招来如此数量庞大的工人,压榨此地的“人口红利”,其他面临劳动力短缺的企业该怎么办?想留住工人,想招到好工人,唯有提高工资。如此一来,企业经营成本便会大幅增加,一些中小微企业便难以维系。

更应当警醒的是,地方政府此举,有碍企业的转型升级。当前,随着土地成本与劳动力成本的日益攀升,一些劳动密集型企业利润空间日渐狭小,生存状况日益艰难,正处于企业转型升级的关键时期。然而政府拉走了大量壮丁,致使劳动力成本陡增,原本就捉襟见肘的中小微企业何来资金进行转型升级?更何况当下中国经济正面临着转型的阵痛。以富士康“代工经济”为代表的低效、低价值的产业模式已逐渐不能适应中国可持续发展的要求。有些地方政府不惜以企业转型的延宕为代价,将富士康纳入怀中,实在是不理智。

政府服务企业,当恪守权力本分,合乎法律法规,尊重市场规律,以企业为本。如此,才有利于构建一个公平的竞争环境,促进企业的转型升级。万万不能以政绩与GDP为本,追求眼前利益,挂一漏万,从而冷落了一些企业。但愿地方政府能够认识到这一点。

中印软件企业发展重要差异在于政策

■ 马妍

比尔·盖茨曾经说过:印度可能成为下一个软件超级大国。这句话如今已经得到了证实。

我国2011年软件产业总产值15万亿元,而印度在2009年时已经达到了这个水平。中国与印度的软件产业几乎是同时起步,但为何现在有如此之大的差距呢?

印度,一个连地铁和高速公路都没有的国家却建起了发达的“信息高速公路”。根据世界银行对计算机软件出口国家能力的调查评估显示,印度计算机软件出口的规模、质量和成本等综合指数名列世界第一。探寻印度软件产业迅速崛起的奥秘,你会发现起着巨大推动作用的,恰恰是高科技之外的“非技术因素”——政策。

政府对软件企业发展的政策倾斜。1984年,拉吉夫·甘地执政伊始,印度政府就把计算机的开发当成了一件大事,他甚至因此而被人戏称为“计算机总理”。拉奥总理执政后,政府又推出财政税收政策,进出口政策、金融政策、知识产权保护政策等,为软件业快速发展创造了良好环境。1991年印度政府发布文件大力扶持软件行业,实施零税负,同时软件和服务公司的银行贷款“优先权”,引发了印度软件行业的一场革命。而从1998年7月,印度政府决定由政府支持给金融风险资本设立10亿卢比的基金,由“小型企业发展银行”(SIDB)管理。同时规定银行优先贷款给新创办的高科技风险公司,尤其是小型企业。相比较而言,在中国,虽然政府大力提倡发展软件产业,但在扶持企业发展的政策措施方面远没有真正到位,政府为部分企业提供资金,没有实际的扶持方法。一方面是政府资源投放缺乏方向,政府不了解这个领域的动态,另一方面是众多有创新业绩的小公司艰难开拓,这就是中国软件产业尴尬的现实。

政府对软件产业发展方向的有效引导。印度国内并没有软件市场,所以印度政府决定其软件产业发展目标和发展战略为主要面向海外市场,大力发展软件外包服务和离岸开发业务。大型软件企业为跨国公司承包价值链高端的产品和服务,中小型软件企业提供诸如解码、编程和测试等价值链低端服务。将印度的主要市场定位在欧美市场,充分发挥印度的官方语言是英语这一得天独厚的条件。相比之下,我国目前还没有形成明确清晰的软件产业发展目标和发展战略,发展环境还没有实现优化,再加上产业发展基础薄弱,国产软件的发展规模和速度还不能为国民经济提供足够的支撑,使得我国在软件产业处在世界发达国家 and 周边发展中国家“夹缝”之中。

政府对计算机教育以及人才的重视。印度信息产业这一片蓬勃景象的背后是强大的科技人才的支撑。有10亿人口的印度现在有合格的软件人才25万人。目前,印度已经建立了7个国家级、两个邦级的软件科技园区,有320万专业人士服务于近千家公司,仅在海外工作的印度软件工程师就有10多万人。印度的软件普及工作也做得非常好,青少年在中学时就接受软件编程教育,基础人才数量充足。印度的软件公司可以让高中生编代码,而且能把软件整体把握得很好,并得到相当好的设计文档。但是,中国的软件行业无论是高级管理人员还是基础技术人员如今仍然缺少大量的人才。一方面是普及程度不够,另一方面是缺少有经验的高级工程师。

软件产业建立了先进的产品流程与管理模式。印度的软件企业重视的是产品开发流程与标准化工作。印度的软件开发管理的特点是流程重于项目,流程管理人员独立于研发部门,专门检查研发部门的开发流程是不是按照既定流程走,如果流程不对,项目肯定就此停止。重视管理与开放的态度使得印度软件业的发展更为迅速。而中国软件业在企业经营管理及技术管理上的中国特色甚至较为原始,远远落后于印度,产品一般面向专业市场,如专注于财务软件的公司、面向企业管理的ERP软件公司或办公自动化产品的公司。

2011年中国企业500强前100强中仅有两家从事软件产业——排39名的华为以及59名的联想。华为与联想在中国都是赫赫有名的企业,“领头羊”一个是任正非,一个是柳传志,都是从市场上摸爬滚打拼出来的。可是得到政策优惠究竟有多少,我们不得而知。

对于中国来说,当务之急便是在产业政策上下功夫,尽快拿出一套科学的产业政策来,扶持中国的信息产业。这些政策应当涵盖税收、资金、人才的培养与引进、知识产权的保护、软件出口、软件基地建设等各个方面。只有依托政策这块基石,以软件为核心的信息产业才能真正在中国大地上挺立起来。

一个国家或地区希望依靠软件外包实现永远的繁荣,恐怕是不太可能的。中国应该走另一条路,大力发展国内软件市场,通过巨大的内需来拉动软件产业的快速发展。通过产业高端化,从制造业发展到研发设计,进一步创出自己的品牌,完整产业链,这样才能永葆繁荣昌盛。

实现从“做大”到“做强做优”的历史跨越

(上接第一版)

发展的持续性。企业可持续发展重点强调的是发展而不是增长。企业可持续发展追求的是企业竞争能力的提高、不断地创新,而不只是一般意义上的生存。

企业的创新性。企业可持续发展来自于创新,特别是伴随着知识经济时代的不断发展,知识创新、技术创新、管理创新、市场创新等已成为企业发展的动力。

环境的应变性。成功企业有一个共同特点,都有较强的适应环境变化的能力和对生态资源利用的适应性。尤其是面对风险的应变能力,在当前显得至关重要。

竞争的优势性。企业可持续发展要实现的是在非平衡中求得竞争的优势,因此,企业必须不断提高自身的竞争能力和水平。

如果做到这样,企业就具备了由做大向做强做优的转变条件。中国企业将以500强企业发布与研究为契机,展开更加宽阔的眼界,承担更加艰巨的责任,怀抱更为执着的梦想,探寻由做大到做强做优的途径。

可持续发展是既要考虑当前发展的需要,又要考虑未来发展的需要;不能以牺牲后代的利益为代价,来换取现在的发展,满足现在利益。同时可持续发展也包括面对不可预期的环境震荡,而持续保持发展趋势的一种发展观。说到底,这便是一种科学的发展观。

中国500强企业应当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引擎”,这些企业的领军人物,应是新时期的民族英雄。中国大企业的领袖们要为中华民族复兴的重任历史性地落在我们这一代人的身上而感到无比骄傲和自豪。

祝中国500强企业不断发展壮大,祝中国500强企业的领导人在做大做强做优的历史大跨越中创造新的业绩,也创造新的企业文化。